

规范认识和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读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和《中国
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

○王爱平

(华侨大学 华文学院, 厦门 361021)

摘要: 谈读黄宗智先生两部研究中国小农经济的力作所受到的启示和思考。认为黄宗智教授尖锐而深刻地指出了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着“规范认识危机”，他的两部专著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思路——推重微观的社会研究，包括地方史研究（区域研究），重视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重视从史实出发对既有理论的思考和辨析，执着从史实到理论、再回到史实的认识程序，等等。对于中国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规范认识；史学研究方法；过密化；史实；既有理论

中图分类号: F129; C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398(2004)04-0109-05

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黄宗智 (Philip C. C. Huang) 先后发表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斯坦福 1985 年版, 中华书局中译本 1986 年版, 以下简称《华北》) 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斯坦福 1990 年版, 中华书局中译本 1992 年版, 以下简称《长江》), 是两部研究中国小农经济的力作。《华北》一书获 1986 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 《长江》一书获 1992 年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其后不久, 黄宗智教授又依据两书的研究成果发表了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英文版《近代中国》[Modern China] 17 卷 3 期, 1991 年 7 月; 《史学理论研究》1993 年 1 期; 以下简称《悖论》) 的理论长文, 对两书的主要结论作进一步的理论阐释, 深刻地触及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乃至中国史学领域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 在美中史学界、理论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笔者认为, 将黄氏这两本专著与上述理论长文结合起来研读, 可以更清楚、更深刻地理解他对中国小农经济及农村社会的研究成果, 本文藉此谈一谈从中受到的启示及有关的思考。

收稿日期: 2004-09-15

作者简介: 王爱平 (1953-), 女, 河南虞城人, 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华侨华人和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一 “过密化”、“过密型商品化”与“过密型增长”

《华北》一书以华北地区为研究范围,以冀-鲁西北33座村庄为研究重点,深入分析自清初以来300年间(尤以20世纪30年代为重点)小农的特点、小农经济的结构及其演变的型式。研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内卷化”(involution)概念——指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由于人口的压力,不是收入与劳动投入同步增长,而是随着劳动投入增加,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研究指出,在人口压力、商业化、政治体制和生态环境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小农经济逐渐发生演变。但是中国近代农村的演变型式不同于西方,西方小农分化过程归结为农村经济的全面转化;中国则在小农经济范围内发展,它所导致的是一个分化了的小农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

作者又探讨了中国农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长江三角洲农民糊口农业自明清以来长期延续的过程和原因,及其变化的过程和原因”^[3](长江)。在《长江》中,作者把“内卷化”改称为“过密化”,并进一步提出了“过密型商品化”及由此推及的“过密型增长”——即“无发展的增长”这两个核心概念。它的基本研究结论是:(1)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经济属于“无发展的增长”类型。(2)中国农村的商品化进程是“过密型商品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总产量的增长的商品化。(3)伴随着国际资本主义而来的加速商品化没有带来质的变化,而只是小农经济的进一步过密化。(4)过密化甚至在集体化与农业部分现代化之下持续,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之前。(5)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具有长期意义的农村变化是随着农村经济多样化而来的农业生产的反过密化,而不是广泛设想的市场化农业生产。

黄宗智教授的研究,汇通中西学术,博采众家之长,而又独树一帜。他把中国经济作为一个结构——功能意义上的整体来把握,明确指出基于西方模式的理论无法概括中国的历史实际,并围绕“过密化”这一中心概念,构建了一个独创的分析模式,极富理论魅力,也大大加深了我们对明清以来的中国经济结构的认识。

笔者认为,对黄宗智教授的具体研究成果可以见仁见智,商榷质疑,但他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思路,他以尖锐的方式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着“规范认识危机”,无疑地,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 规范认识危机的提出

这是黄宗智的研究对于我们最富启示性的一点:它从超越于彼此对立的现有各学派之上的方法论的高度,指出了作为各派共同认识基础的一系列的缺陷,这触及到明清和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核心难题,而且也适用于整个中国史学领域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有关研究。

在《悖论》这篇理论长文中,黄宗智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所谓规范认识不仅是指以往学术界的各种模式,更是指“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黄宗智强调指出,“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它们才是托马斯·库恩1970年《科学认识革命的结构》中的‘规范认识(paradigm)’一词的真正含意”。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存在着“封建主义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之争。前者认为,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基本上没有变化的,是与近代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停滞的封建社会,认为封建经济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最终阻碍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萌芽论”认为,西方人侵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明清时期决非是停滞的,其时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西方学术界与中国的研究出人意料地相似,只是“这里不再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模式,而是源自近代化理论的‘传统’中国

与‘近代’中国的对立模式”，^{[1](44)}存在着“停滞的传统的中国”观念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和“近代早期论”之争。“近代早期论”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其出发点是认为明清时期存在着经济的大规模商品化。黄宗智在分析以上学术观点的理论渊源时指出，中国学术的主要模式系源自马克思的古典理论，曾主导中国历史研究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范畴均出自马克思对西欧，尤其是对英国的分析。而后传入的西方学术的主导模式又主要得自两个理论：先是马尔萨斯，后是亚当·斯密^{[1](46)}。

黄宗智进一步尖锐地指出，尽管中国与西方的学术研究有着种种不同，但两者明显有许多共同点。“两个学术派别均把停滞与前商品化经济相联系，把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中国的‘封建主义论’学派之所以认为封建经济是停滞的，是因为把它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一样，他们也认为商品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与此类似，西方‘传统中国论’学派认为明清经济基本上没有商品化。”这种规范信念“贯穿了大洋两岸学术界的两代人，也贯穿了斯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1](47)}。因此黄宗智强调，规范认识性的信念是为不同的或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认为“这样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

黄宗智的分析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我们在研究中往往自然而然地以西方标准、以这种规范信念来评价中国经济历程，尽管近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一系列悖论现象的存在，即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一系列悖论现象已经在挑战那些规范信念。但是在史实与理论相冲突时，虽然有时也认识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但并未对西方模式的普遍性产生怀疑。那些被认为“再明白不过，乃至无须再加以讨论”的“共同的认识”，往往成为我们立论和思考的规范性前提，而实际上这些所谓“不言而自明”的“规范认识”并没有真正经过中国历史实践的检验。所以，“规范认识危机”的提出，也揭示了历史研究中相当关键的思维方式的问题，即立论和思考的规范性前提的可靠性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关键问题，黄宗智尤其推重微观的社会研究，包括地方史研究（区域研究）。他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理论和规范。”^{[1](48)}他认为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很重要；而“集中于一个地区使我们有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内部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来研究”，从而发现和提出本质性的问题^[2]。黄宗智又提出，发现和鉴定悖论现象也是设计要研究的问题的好方法，由此可以对假定的因果关系提出怀疑。总而言之，就是要“由史实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再把历史削足适履”，要通过大量的微观的社会研究，“跳出以近代西方经济学为规范的理论框架，建立适用于中国经济实际的概念和理论”。^[3]

三 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思路

黄宗智的《华北》、《长江》两书正是摆脱既有规范信念研究的典范。笔者对黄宗智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思路深以为然。在两书的“中文版序”中，作者都明确强调自己的基本方法是“有意识地循着从史实到概念再回到史实的程序进行研究，避免西方社会科学中流行的为模式而模式的作风，和国内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以论代史的倾向”，“试图从最基本的史实中去寻找最重要的概念，然后再不断回到史料中去检验，提炼自己的假设。”

从史实而不是从固有的理论出发研究历史，这对于中国史学界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却是一个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说易而行难。我们且看黄宗智教授是如何进行研究的。

1 史料 要从史实出发研究历史,首先就有一个有无能反映和说明史实的史料的问题。目前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小农和村庄,仍严重地受到史料不足的限制。研究者如何发现和发掘史料显得尤其重要。黄宗智在“两书”中通过“发现”,使用了三种资料:一是主要使用了出自30年代人类学家实地调查所得的资料;二是自己实地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三是档案等文献资料。

在《华北》的研究中,黄宗智首次系统地利用了“满铁”的调查资料,经过审慎的分析、鉴别和批判,得出结论,认为这是现存有关资料中“最详细、最精确”的资料。

现在这批资料已为多位中、外学者所使用,并已推出多部研究成果。为了核对和补充这些30年代的调查资料,作者还亲自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在《长江》的研究中应用了自己实地调查的资料。要清楚地掌握乡村社会经济长期变迁的过程与趋势,还必须对其考察一段较长的时间,作者为此又研究、使用了有关的档案史料,其中包括一些从未使用过的地方县署刑房档。这样就“把满铁资料显示的变化追溯到清代前期”。两书的研究实践说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需要实地调查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并用,人类学的方法与历史学的方法应该也是可以结合的。

2 理论 虽说研究历史首先要去调查搜集资料,但是只要一思考问题,就必定要进行对既有理论的思考。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研究的实践必定如此。即使是华北、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这类区域性的实证研究,首先遇到的也是对有关理论的思考辨析问题。

理论,实际上主要是指西方经典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理论),因为在我国可以称得上“科学”的史学研究,实际上是在近代受西方理论影响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正如黄宗智所谈到的,不论是马克思,还是马尔萨斯或亚当·斯密的理论,均来自西方。

黄宗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长江》中文版序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历史研究必须联系理论,但理论,尤其是政治化了的理论,很容易成为探索历史真实面貌的障碍。在研究过程中,我一直执着从史实到理论而再回到史实的认识程序……”,又强调说,“对现存各家学派的理论,争取去误存真,建模式于实际。”

两书首要的章节都用来讨论和辨析有关的理论,以往研究中应用的或建构的模式、概念问题。在《华北》的研究中,作者力图把三大农民理论(舒尔茨、蔡雅诺夫、马克思)综合起来,他通过辨析正确地指出,每种理论都只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在《长江》一书中,首先对斯密和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舒尔茨和蔡雅诺夫这两个现代主要派别的理论进行辨析和反思,指出这各种理论的适用与不适用之处。在具体研究的叙述中,对于以往研究的有关中层理论、模式,如“二元经济论”、施坚雅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等也都根据需要随时进行分析。

3 概念 笔者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在史实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个“概念”的层次。若真正做到从史实出发进行研究,既可以利用理论帮助我们打开视野,提出问题,又可避免各种既有理论的干扰,一项必不可少的研究步骤,就是要从最基本的事实中寻求重要而适用的概念,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

在两书中,黄宗智据蔡雅诺夫的理论 and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的模式,转用了吉尔茨研究印度尼西亚爪哇水稻农作提出的“过密化”(“内卷化”)的概念,并做了新的界定。“这一社会经济史的思路虽然长期以来备受争议,但却一直是讨论中国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之关系的理论前提,其学术规范性能力之强是显而易见的。”^[4]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黄宗智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强调指出,“源自第三世界的分析概念比西方经历的模式有用”。他说,“我自己关于过密化的概念就得益于蔡雅诺夫和克利福德·吉尔茨的模式,它们都是基于对非西方社会的微观研究”。^{[1](30)}笔者以为,这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一样都具有后现代化型的特点所致。

四 疑问与商榷

最后,谈谈对“过密化”论说的一些疑问。

其一，作者提出区别“发展”与“增长”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是，以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农业发展与否的最主要标准，而又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作为衡量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唯一标准，是否符合中国小农经济的农业经济的实际？对单位工作日报酬的计算方法，如等同于集体经济中的工分值等，是否合理？笔者以为，作者对其所应用的西方经济学的“边际”概念的辨析似嫌不足，对中国小农经济的本土化的辨析似还不够充分。

其二，“过密化”现象是否是500年间普遍的、持续进行的过程？作者认为“过密化”自明清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之前，所依据的材料似未能充分说明这样的结论。

其三，尽管作者强调分析研究注意兼顾人口和生产关系两方面，但“过密化”论说中显然是把农业经济不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归结于人口压力，认为人口压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对此结论似可以商榷，这是否有一种线性因果关系分析代替另一种线性因果关系分析之嫌？

其四，“过密化”的论说对于人口、经济因素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似乎考虑不够。

最近读黄宗智教授1999年发表的“中国法律制度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论文，其中谈到对法律制度可做经济史的研究，目前所做对法制史的研究可看作是过去研究中国小农经济工作的延伸，“想进一步阐明中国小农经济的组织原则，说明它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再读到黄宗智教授对中国小农经济、中国社会史更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佳作。

参考文献：

- [1] 黄宗智. 中国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 [J]. 史学理论研究, 1993, (1).
- [2]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3] 黄宗智. 中国法律制度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 [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9, (2): 103.
- [4] 杨念群.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J]. 清史研究, 2000, (4): 69.

Pondering over Standard Recognition and Method of Historical Study

—Reflections on Reading Huang Zongzhi's Two Books about Chinese Small-Scale Farming by Individual Owners

WANG Ai-ping

(Faculty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Huaqiao Univ., 361021, Xiamen, China)

Abstract: After reading Huang Zongzhi's two masterpieces about Chinese small-scale farming by individual owners, the author pays attention to "crisis of standard recognition" which exists i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hinese social economy at present; and pays attention also to the basic method and thinking of Huang's research, as shown by his two books. Evidently, Huang has a high regard for micro social study including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 he attaches importance to first-hand data and perceptual knowledge obtaining from the study of anthropological method; he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ponder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of existing theories from historical facts; he insists on the sequence of recognition going from historical facts to theory, and back to historical facts again and so on. All these are of important inspiring significance to the academic research in China.

Keywords: standard recognition; method of historical study; overcrowded; historical facts; existing theory

【责任编辑 龚桂明】